

学校德育与承传中华美德

（南京东方红学校德育研究所 王殿卿）

盛世兴德

富贵不能淫、富而好礼、礼仪之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意。面对 21 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新变化，道德建设将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化与国家的独立、尊严、主权矛盾运动中道德新格局与人类共同伦理；经济全球化与贫富两极化过程中的道德变革；世界文化的多元冲突、对话、融合及民族文化与道德的复兴；高科技时代的科技道德及其建设；网络技术迅速普及，人与人之间虚拟交往与现实交往过程中的道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成熟与规范并走向世界市场对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新要求；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于独生子女支撑老年社会提出的道德新要求；世界性的性自由、性解放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对中国传统性观念、性道德、性文明，乃至整个社会道德文明建设的挑战；在道德教育与建设中，代际道德传递、社区道德传递遇到的新矛盾等等。我们将在研究与应对这些新问题的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和小康社会的新文明。

仓廪实，而需礼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精神文化、道德文明，有了新的呼唤与追求，尤其关注子女们的健康成长及其前途。有些摆脱了“重智轻德”怪圈的家长，不愁子女将来“无职业”，最怕他们“不成人”。

家长们希望子女成为国之栋梁，却又担心有人变成贪官污吏；希望他们成为腰缠万贯有作为的企业家，却又担心有人变成见利忘义、图财害命、走私贩私的奸商；希望他们成为有科学成就

的专家学者，却又担心有人变成害人、杀人的帮凶；希望他们学习好英语和现代信息技术，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却又担心有人变成嘴里说着英语，手里举着“汉堡”，浏览因特网上的欧美大片，欣赏摇滚音乐，染着黄、红、绿色的头发，开着进口汽车，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心中只有自我的“新人类”；希望他们成为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却又担心他们染上恶习，为非作歹，沾上艾滋病，加入黑社会……。

希望与忧虑并存，可怜天下父母心。化解忧虑、实现希望，已成为广大国人的心愿。满足这种心愿，是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也是党和政府顺民意、得民心、执政为民的重要内容。青少年一般有 9—16 年的时间在学校里度过，这是他们形成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最佳时期。因此，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德育的方向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就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新世纪学校德育的重点之一，应当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的内容，应当是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进行古今中外道德智慧的综合创新，而不是割断历史、全靠进口；新世纪的道德教育，要在基层学校进行扎扎实实的实验，在取得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理性升华、逐步推广，力争用 15—20 年的时间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道德教育新体系。道德教育与建设、民族精神的培育，一般需要 1—2 代人的连续奋斗，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更不能形式主义、作表面文章。道德建设与教育这种长期性的特点，使得一些追求短期政绩的官员，不在道德建设与教育上用真心、使实劲。

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

强调道德教育,会不会影响与削弱政治教育,导致“淡化政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学校德育任务与内容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在“文革”时期甚至“突出政治”。因此,至今一些中小学校仍然保留着“政教处”、“政治课”、“政治教师”等等历史概念。长期形成的重政治轻道德的教育理念,并没有因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而有多大改变。这种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直接后果,使得一代以上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下降、社会道德风尚日渐衰败,致使整个社会在15—20年后,承受道德沦丧的惩罚。

早在198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中就指出,政治素质是对于先进分子提出的要求,而对于广大国民素质的要求是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邓小平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也将“有道德”放在了第二位;2000年,江泽民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2001年,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的方略,当年,党和政府又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可见思想道德素质、道德教育与道德建设的迫切与重要。

道德与政治是难分难舍的。政治决定着社会发展方向,道德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不讲道德的政治,容易成为腐败的政治。

道德素质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我们应当有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但是,一个缺乏道德素质的人,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信念。忽视道德素质教育和道德建设,必将从根

本上削弱政治素质,也就难有政治文明。

社会道德风尚的兴衰与政权的兴衰,有着必然的联系。而统治集团的道德风尚,主导着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统治集团的道德衰败,必然导引社会道德风尚的衰败。当这种衰败达到一定程度,超过某种警戒线的时候,政权的基础就易动摇,这是一种历史的明鉴。

用“淡化政治”的思维,限制道德教育与建设,最终会削弱或毁掉政治。

中华美德与中国人的品格

中华传统美德,是世代相传并不断调整和更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它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它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规范着每个中国人。

从尧舜“禅让”、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到齐国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都属于儒学之前的道德文化。而周代以“礼”为主导的道德,则是儒家创始人们直接的思想渊源;孔子虽然提出了“仁”的概念,但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导道德规范,仍然是自周以来形成的“礼”,而不是“仁”;孟子强调“义”,但是他给当时社会主要道德规范的定位是:仁、义、礼、智“四德”,把“仁”放到了第一位,将“礼”降到了第三位;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只是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了“信”。从此,自周以来所逐步形成的这五种道德规范,才真正成为被官方认定、推向社会并影响深远的道德规范。由汉至唐,先后提出以“孝”治国,推行“举孝廉”的“吏制”,“孝”与“廉”这两种道德规范日益受到新的关注;于是,宋代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与“悌”。这“八德”,一直影响到明清,以致影响到朝鲜、韩国等东亚各国。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弱势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

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蔡元培等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国民党在“八德”的基础上,加上了“礼义廉耻”这“四维”,统称为“四维八德”,沿用至今。

中国传统道德演变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形成自己的人格,并成为中国人的历程。2002年5月,江泽民要求当代中国青年“努力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做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做新型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

中国传统道德在东亚各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那里道德建设的经验,可供我们参照。

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韩国的存活率是相当高的。汉城,是古代朝鲜朝的都城,其城门的名称就足以体现当政者以德治国的思想。汉城的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各自名称如下:东大门是“兴仁门”、西大门是“教义门”、南大门是“崇礼门”、北大门是“弘智门”。建筑在汉城市中心的“钟楼”,被誉名为“普信阁”,它表明普天之下,都要讲信用。这“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国汉代“五常”。在韩国,当今的社会共同道德,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在青少年中,重点进行忠、孝、礼“三德”教育。忠,是效忠大韩民国;孝,是亲情之爱,强调“孝道”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础性及其时空超越性;礼,是人际文明的规范,注重礼节是韩国人不变的民族形象。

新加坡1965年独立建国,40余年的成功之道,是重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德治与法治并举。首先,将“富而有礼”定为建设的目标。其次,1982年,政府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种美德,作为“治国之纲”,定为国家道德。再次,新加坡政府1990年发表了《共同价值观

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五大共同价值观是对东方或儒家价值观的一种创造性转化,也是东方或儒家的价值观强大生命力的体现。第四,新加坡政府通过继承和发扬东方文明和东亚价值观,在多元的社会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国民中树立起一个“敬业乐群、勤劳进取、廉政奉公、讲求效率”的新加坡精神,为新加坡的社会稳定 and 经济发展,开拓了精神动源。

100余年,我们对待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遗产,重批判,轻继承;剔除了糟粕,淹没了精华;“破”字当头,未能“立”在其中。只有到了20世纪的最后20年,在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才认真反省历史,从不断革命,转向了建设、创新与发展,逐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战略。建设中国的新道德,必须以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为根基,必须开发和利用中华民族5000年优秀道德文化的丰富资源。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的指导下,创建适应新时代的道德规范体系。如果离开中华美德去建构中国的道德新体系,就如同用自己的手揪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土地那样不明智。

中华美德与学校德育

注重道德教化与化民成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华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力量。对于新一代中国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1991年12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厦门大学说过:广大青年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对他们要经常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同时也要经常进行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教育。例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是很有作用的。应该说，这些话都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一些富有哲理，教人正直、忠贞、有抱负的名言。学习和掌握它们，对于自己立身行事，为国家、为人民建功立业，是会受益匪浅的。

为了矫正建国以来没有认真、系统、有效地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的失误，1993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4年中共中央下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两个文件，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做出了明确规定。从此，接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也就成为每位教育工作者的义务。

1995年年底，由李岚清同志主持，教育部具体组织实施，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中国传统道德》一书正式出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集中国内一流学者，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资源所进行的大规模开发。李岚清同志在此书的序言中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根本目的，在于结合革命传统教育，更加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在于使社会主义道德具备更为丰富的内涵；在于更好地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于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为了参与当代中国新道德建设，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为核心德目，本着小学讲故事、中学讲规范、大学讲理论的思路，编写了大中小学使用的教育用书和教育实验教材。从1994年至今，连续9年在北京和山东等7个省市的部分地、市、县，开展了“大中小

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和“学校中华美德教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研究”，先后连续被批准立项为“八五”、“九五”、“十五”北京市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分别有4万、25万、35万余名大中小学学生接受了此项教育实验。

为了帮助参与实验的教师了解传统道德的历史演变，把握和分辨传统道德精华与糟粕的两重性，认识传统道德的历史价值，探讨传统道德对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回应，掌握提升自身道德修养的路径，1999年组织8位文科博士编写了一套《大众道德》丛书共8部。分别是：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

《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编写这套丛书，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当中那些具有超越时空的民族智慧，进行再加工、再转化、再生产。帮助教师认识“八德”在当今社会生活之中的现实存在及其价值，认识这“八德”与20字公民道德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看到大中小学的“学生守则”当中、市民公约当中、各行各业职业道德当中、治家之道、兴业之道、治国之道当中，所浸透着这“八德”的精髓。这“八德”是中国人共同的道德文化价值观，它不仅是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需要具备的品德。

九年来教育实验研究表明，只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新一代中国人是完全可以认同、接纳中华美德，并转化为自身的品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种教育不仅是学校德育有了民族性的根与魂，而且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与支持。家长满意就是人民的满意，这正是学校教育的理想与追求。